

#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延安的原野

——我的杨家岭采访本

□高建群



1942年,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

田间是1982年4月底回延安的。那是一个暮春的日子,万花山上开满了牡丹花,瘦瘦矮矮的诗人,一步三喘,踏歌而行,缓步向花从中走去。

田间是1938年奔赴延安的,延安的街头诗就始于田间。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,敌人,用刺刀,杀死了我们,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,看,这是奴隶!”这是田间的街头诗。街头诗的始作俑者,当然还有陕北籍诗人高敏夫——陕北无产阶级文学的开拓者之一,他大约是受了苏联文学浪漫气氛的感染,一度曾易名高尔敏夫。田间这个当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翩翩少年,如今已进入生命的暮年。坐在延安宾馆里,他用深沉苍老的声音,向慕名而来的青年讲述着往事。人们一走,他便默默地靠在沙发上,半闭着眼睛,像一位鏖战归来的疲惫士兵,不是鼓掌,许多年前,闻一多先生曾这样称颂过他。

上面这一段文字,是我当时采访他时的手记,那个慕名而来的青年,说的就是我。记得田间的身材大约一米六不到,穿一身有些褪了色的蓝人民装,粗一看像是灰色,戴一顶同样颜色的帽子,帽檐耷拉下来,遮住了眉头。他神情忧郁,不知为什么满腹心事。一条三人沙发,他蜷曲在沙发的一角角落,显得那样矮小、疲惫,全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。他用一种沙哑的声音回答我的采访提问,话语很短。谈话间,只有当提及延安时代的时候,他暗淡的眼神才猛然闪出火花,眼睛像鹰隼般闪闪发亮,但只一会儿,又暗淡下来。

田间在延安待了三天,参观了枣园、杨家岭旧址,去延安城南三十里的万花山参加了延安文学青年的一次诗会,朗诵了他即席创作的《延安万花山》,并且给当时的延安大学创作学习班的学员做了一次报告。

老诗人在报告中说:“我是1938年来延安的,我还要继续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,还要不断从延安这块土地上汲取营养,这就是我这次来延安的目的。什么时候都不应当忘记延安,没有延安就没有我们的人民共和国。我觉得《讲话》的一些基本东西还是要肯定的,还是值得我们继续学习的。《讲话》的根本点是‘文艺为人民服务’的问题,这在现在更应该肯定。经过‘文革’的一段曲折,《讲话》依然是光彩夺目的。正像我刚刚完成的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:虽然是风尘仆仆,但是掩盖不了它的光辉;尽管它山回路转,依然是宝塔山;虽然时间推移,但旧时的牡丹还是那样璀璨。”(根据录音整理)

田间临走时对我说,他现在隐居在北京后海的一家独门小院里,要我去北京时一定不要忘了去他那里一叙。他还说,终于回了趟延安,了却了他一桩心愿,他年事已高,身体又不太好,怕是最后一次回延安了。老诗人的话不幸言中,他回去后不久,我就从报纸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。

1982年5月23日前夕,陕西组织一批新老文学艺术工作者来延安,胡采、王汶石、杜鹏程、李若冰四位老作家带队,一行百余人,在延安杨家岭开了纪念大会,并去枣园、南泥湾等处与当地群众联欢。

胡采是当时陕西唯一健在的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人。当年毛泽东同志讲话之前,全体人员曾有一张合影。时值纪念“5·23”《讲话》,讲解员将这张照片放大,用一个木牌立在杨家岭那间石屋前面。胡采当时是边区文协副秘书长兼《群众》周刊负责人。见到照片后,我问:“胡老,你站在哪里?”抑或是谦虚,抑或是确实记不得了,胡采说,他不记得拍照这事,拍照的这一次会议他也许没参加,说完就随参观人流进入了石屋。我不甘心,在照片前仔细端详,终于发现在一大堆人头中有一个颇像胡采,脸型像他,神态像他,细细的长脖子上是一颗小小的头。我赶紧去找胡采,胡采重新回到照片前,仔细地辨认了半天,辨认出了他左右站着的人,终于确定了那确实是当年的他。后来就有一茬一茬回延安的老同志回忆,那确实是胡采。照片上所有的人后来都被回忆起来了,名字附在照片下面。胡老当时像孩子一样笑了。站在旁边的我亦十分感动。

王汶石、李若冰延安时期曾是“西工团”的演员,20世纪50年代后期,前者以《风雪之夜》、后者以《柴达木手记》驰名于当代文坛。联欢会上王汶石在大家的起哄下,将延安时期演过的一个角色(《二子上改造》)重演了一遍,博得满堂掌声。李若冰善良而精细,他政治上与艺术家的风度并存,后来我长期在李老手下工作。印象最深的恐怕要算是《保卫延安》的作者杜鹏程了。杜老当年已患脑血栓,行动不便,但还是参加了所有活动。记得上南泥湾的一个山坡时,他差点跌倒。早年的超负荷伏案劳作和“文革”中所受的迫害,给他的身心以极大摧残,他除了行动不便外,感觉精神也有些恍惚,心智不大清醒。在延安的日子,他常常激动得难以自持,嘴唇发颤、手指发抖,在他面前,我强烈地感觉到老一輩战士兼作家的气质。

1979年陕西协作恢复活动后的第一次作家协会座谈会上,几位老延安听说我是从延安来的,立即将我拉过来坐在他们身边,事情过去许多年了,这事我一直念念不忘。杜鹏程于1991年冬去世,病危期间曾给我来过一封短函,勉励我努力创作。

1982年5月28日至30日,陈荒煤率电影“百花奖”“金鸡奖”颁奖大会上的一行人来延安。我对陈荒煤慕名已久,奈何由于有白杨、田华、王心刚、李谷一、李秀明、龚雪等一众名流,所到之处尽被人围观,不能近前,而我又习惯于凑热闹,因此未曾谋面。

是年9月30日,葛洛、韦君宜率华北、西北地区中青年作家来延安参观学习。葛洛是河南洛阳人,那一年62岁。他1938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来延安,抗大毕业后,任鲁艺助教,在下农村体验生活期间曾先后兼任碾庄乡、桥儿沟乡副乡长,1946年随解放大军离开延安。这个团队里还有铁凝女士。那时她多年轻呀!乌黑的头发,明亮而乌黑的面子,一个女人安静地坐在会场一个角落,听韦君宜讲课。我后来有一次跟她说起这事,铁凝说,这是她一贯的风格。

工作之余,葛洛重返碾庄和桥儿沟。葛洛住过的碾庄,当年的老房东已经去世,他与房东的儿子畅谈旧忆的事。这个房东或许还是他解放区小说《卫生组长》中的原型吧。最使葛洛激动的是,在桥儿沟的一座山坡上,他找到了当年在鲁艺结婚时的土窑洞。他说:“找到这里好似当了第二次新郎!”葛洛的人缘极好,在碾庄、在桥儿沟,还有不少老人记得这位当年的老学长,故人相见,即情即景最为热闹。

“千声万声呼唤你,母亲延安就在这里!”是年11月23日至25日,著名诗人贺敬之回延安。这是诗人继1956年回延安参加“五省(区)青年造林大会”写出那首脍炙人口的《回延安》之后,第二次回来。诗人是年58岁。那天,陕北高原降了一场薄雪,诗人参观了枣园、杨家岭、桥儿沟等革命纪念馆,并且登上了清凉山。登山时吟诗一首,诗云:我心久印月,万里千回肠,劫后定痴水,一饮更清凉。延安文学艺术界为诗人的到来举行了一次座谈会。会上,一位业余作者朗诵了诗人的《回延安》,纪念馆一位讲解员唱了诗人作词、马可谱曲的《南泥湾》,唱到情深处,贺敬之掏出手绢,拭起泪来。

薄雪初晴,我和陕报记者、评论家肖云儒,陪诗人上了一趟宝塔山,诗人穿一件旧黄布大衣,蹬一双平底鞋,居延安多年,我竟不知道宝塔可以上去,诗人说可以。于是,我在前面牵

着他的手,顺着宝塔里狭窄陡峭的台阶,上到了第二层的瞭望口。本来还可以上到最高层,我怕他有个闪失,拦腰抱住了他。站在这里,三山交汇、二水分流的延安城尽收眼底。诗人说宝塔南边的那条小沟里,当年有一个日本工农学校,日本轰炸延安时被炸成了废墟。说到这里,他面色严峻,久久没有说话。后来他又说,鲁艺有一架钢琴,冼星海的《黄河大合唱》就是在这架钢琴上弹出来的。1947年撤退时,行军途中,将钢琴拆成零件埋了起来,那架钢琴是一件珍贵文物,如果能找到它,会是一件教育后代的活教材。诗人走后,延安有关方面曾多方查找,钢琴至今仍未沉入大海,杳无下落。诗人走后,我在《延安报》发表了专访《双手搂定宝塔山》。

贺敬之大约在1985年还回过一次延安。我将自己的采访日记翻了翻,可惜平常丢三落四的,没有找到那个时期的采访本。

而与贺敬之齐名的另一位杰出诗人、才华横溢的郭小川,70年代初曾回过一次延安,有《郭小川诗选》扉页的那张照片为证。那时我正在“白房子”服役,无缘拜识,可是我的朋友、延安诗人原上草却有缘与他邂逅。原上草正在清凉山下延安河桥旁的一家小饭馆吃饭,郭小川登清凉山下来,也到了这家饭馆,并且坐在了同一张桌子上。原上草是诗人郭小川最热烈的毫无保留的崇拜者,他可以将郭小川所有诗作倒背如流。原上草是个见面熟,不知怎么就打听到了眼前这位有些忧郁的人就是郭小川,当时惊喜的状况我可以想见。除了表达久仰的心情外,他开始背诵起郭小川的诗句。我想在那个严寒的日子里,贫病交加的诗人一定会被深深地感动并有一丝慰安的——他的作品是如此深入民间。我也是郭小川热烈的崇拜者,郭小川去世十周年时,我曾在《西安晚报》上发了篇《郭小川十年祭》,随后将晚报寄给他的夫人杜惠。

蔡其矫是1938年到延安的,在鲁艺任教,大约是1938年底又随部队下了太行山。他在延安短暂停留,就顺着当年南下的路,经延川黄河延水关渡口走了。此行他留下了一首诗《过延川》,写得漂亮极了,诗中有一句:“漂泊的灵魂,永远寻求陌生的地方。”我在座谈会见过他,记得他身体强健,穿一件运动服,像运动员一样,并不显著。

1982年10月,杨沫来延安参观访问,因为《青春之歌》,她是家喻户晓的作家,更兼她和白杨是姊妹,因此上次没见过白杨的人,这次都来看她。杨沫参观了革命旧址,上了清凉山,所到之处,均受到十分隆重热烈的欢迎。作家和延安文艺界举行了几次座谈会。记得她戴着假发,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人戴假发。记得我采访她时,面对面相坐,膝盖盖着膝盖,突然她一个喷嚏,头一勾,假发掉了下来。而她像个没事人一样,两手一张,搂住头套,又扣回头上。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

1984年3月8日,杨植霖取道银川,回到延安。杨曾是职务很高的地方领导,因为《王若飞在狱中》一书留下文名。我陪杨老四处参观,很是忙碌了一阵。最感人的是在兰家坪寻找他的故居。那时大约是1942年,当时他是内蒙古的领导之一,中央调他来党校高干二部学习。他在一座荒凉的山坡上找到了一孔半是坍塌的窑洞,说上党校时他就住在这里,他的隔壁住的是丁玲和叶群。叶群当时好像还没有和林彪结婚。他说,丁玲为人直爽是个女中丈夫,那年三八节,他和丁玲站在这山坡前,远远的一个背着三八大盖的人过来了,这时丁玲抓住他一个胳膊,手有些发抖。丁玲对他说道:她平日最忌讳三八这两个字,一见背三八大盖的就发怵。

杨植霖很高,大约一米八三,穿一件黑呢子大衣,毛围巾平展展地交叉裹在胸前。虽是汉族,但大约是在土默川出生的缘故,他的气质中有一种蒙古族朋友那种真诚而豪迈的东西。杨植霖回甘肃后,将他与人合著的诗集《青山儿女》寄我。杨植霖老此行还有一个目的,就是倡导成立中华诗词学会。他在延安联络了黑振东,在西安联络了杨鸿章、华松林,在内蒙古联络了布赫,在北京联络了楚图南、周谷城。中华诗词学会于1985年端午节在北京成立。我参加了成立大会。

1984年5月7日至10日,时值《讲话》发表42周年,方纪、草明、曾克、金紫光、何洛、李琦、刘芳、路明远等一行老延安,由中国文联组织回到延安。

方纪半身不遂,坐在轮椅上,由他的儿子方大明推着。据说他在“文革”时期受到过极大迫害,冤狱长达10年之久。他的神智大约也有些不太清楚,在参观王家坪纪念馆时,看见玻璃柜里陈列的纺车,他一下子激动得快要从轮椅上跳下来,他说这纺车是他的,是他大生产时用过的。我们怕他失手砸坏了玻璃,只得赶快离开。纪念馆墙壁上陈列着那些首长检阅时的照片,他突然一挺胸脯要站起来,向首长敬礼。大家赶忙拦住他,说这是照片,不是真人,可他还是要致敬礼,于是只好由他了,他坐在轮椅上,大约是向彭德怀将军或者陈赓将军,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。不过在我采访他时,他的神智很清楚,他能记起早年那些事情的细枝末节,我问他著名散文《挥手之间》的写作经过,他说,当年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,延安东关旧飞机场,他也是欢迎人群中的一员,目睹了毛主席登上飞机的情景。那时,他像所有在延安的人一样,为毛主席的安全担惊。后来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毛主席走下飞机时挥动帽子的那个特写镜头。那是历史的一瞬间,对着这张照片,他觉得他想要创作的这篇散文有了标题和主题。方纪的右半个身子不能动,他用左手写毛笔字,书法苍劲有力,写完字后,落款上还要写上“方纪左手”几个字。

草明一头银发,剪得很短很整齐。年轻时候的她大约也是这么干净利索和漂亮,一副南国女儿的样子。我和草明有几次

详谈,主要是采访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况。草明告诉我,从那年二三月份开始,毛泽东同志就筹划这个会了,只是当时他们不知道。毛泽东先后约欧阳山和草明到他的住处详谈了三次,询问一些文艺规律问题和当时文艺界的情况。等到会议开始时,他们才知道主席的本意。她说,会议大约是从5月10号左右开始的,断断续续,开到23号,毛主席一共来了三次,参加大家的讨论,做讲话。会议之后,在《讲话》精神的鼓舞下,许多艺术家纷纷深入到农村和部队收集素材,进行创作。草明还向我介绍了她创作新中国第一部工业题材的长篇作品《原动力》及《火车头》的情况。采访她时,她的秘书李珊珊给我茶杯里只放了几根茶叶,爱喝浓茶的我喝茶时不住地揪茶叶筒。

曾克和草明不同,留着一头乌黑短发。她的性格和草明相反,显得沉郁一些。她当年在重庆的邓颖超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后,由邓大姐介绍来延安的。在看座谈会那张照片时,她对我说她的那种发型是邓大姐让留的。来延安前,她欲将发型改成当时革命队伍中那种流行的短帽盖,邓大姐说她这种发型也挺漂亮的,革命主要是行动,发型倒在其次,于是她就带着这种发型来到延安。

后来我在《延安报》上,为以上三位作家各写了一篇专访。那天陪三位和金紫光去了枣园,从枣园下来,他们要去兰家坪中央党校高干二部旧址去寻各人当年的故居。我和小辛一起先到了杨家岭,在杨家岭那口井旁等了很久,四位老人才风尘仆仆地从兰家坪来到这里。那张合影照还在那里,我指给他们看。草明首先在前排找到了自己,她的面孔和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,头型也一模一样,只是青丝变成了白发。接着,曾克也找到了自己,她当年的神态和现在也是一模一样,好像岁月在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方纪在方大明的帮助下也找到了自己,大约他家里也有这么一张照片。三个人像孩子一样笑着,眼泪涌了出来,当年延安时期那圣洁的阳光在这一刻重新照在他们脸上。只有金紫光没有找到自己,他很沮丧。草明告诉我,这是5月23日会议结束一天开始时的照。他要金老好好回忆,金紫光还是回忆不起来,只好说:那时,他大约已随部队离开延安了。根据现在的纪念馆工作人员整理的名单,会议有金紫光,不知道金老回忆起来没有。

这次聚会还发生了一件大事。歌曲《松花江上》的作者张寒晖的尸骸找到了。张寒晖死于1946年,埋在边区文协山顶的文化山上,还立了一块墓碑。后来胡宗南进攻延安时,墓碑被毁,墓室也找不到了。张寒晖夫人刘芳这次特请了十几位当年抬过棺材的人,包括路明远等一起来到文化山上,口中念叨着胡仲平老师的“文化山头葬寒晖,一把土来一把泪”诗句满坡寻找。有人说,他抬到这里时歇了一歇;又有人说,他抬到那里时换了换肩,终于,他们证明了与延安宝塔成等高线,距宝塔西约500米的一个小土包,即张寒晖墓室。大家在一张纸上签了名,我则以《延安日报》记者身份也签了名,署名见证人高建群。刘芳将这张纸装进一个塑料袋,埋在地下,又用一块石头压住。第二年的“5·23”,张寒晖墓被搬迁到李家洼四八烈士陵园内。

1984年7月23日,作家康濯回延安,也是一种缘分吧,在延安为康等一行放映电影《延安生活散记》时,我恰好和他成为邻居。康濯离高极瘦,和胡采一样,也是细长的脖子上擎着一颗小小的头。他言谈举止有一种内在的风度,这是经历过许多的人才可能拥有的,我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。那时我正处在创造的苦闷期,我向这位老作家请教了许多关于艺术的问题,我们一见如故,一直谈到电影散了,约好第二次再谈。康老告诉我,不要急,艺术靠的是一种韧性,只要努力,时间会完成这一切的。第二天采访结束后,他将自己写的一首《七律·返延安》亲手抄在笔记本上,诗如下:不尽风云又返延,重温四十五年前。窑洞火炬辉天外,塔影华安耀远天。耕战整风埋旧梦,工农科技建伊翁。容颜不改情犹炽,圣地精神代代传。7月24日参观后,康濯离开延安,是年8月,将他的长篇《水滴石穿》寄我。1987年,我的一个中篇在《中国作家》发表后,康老来信祝贺,勉励我继续努力写作。后来我听说康濯负责鲁迅文学院,曾去信询问,康老来信说,那是别人的意思,他要抓住晚年有限的一点时间写点东西,不会再干这种社会工作了。再后来,得知康老去世的消息,我很震惊,也很悲痛,曾经想提笔写一点东西纪念他,千言万语,竟不知如何说起,借上边的一段文字,权当是献给他的一个花环吧。

1984年10月19日,《三家村夜话》的作者之一廖沫沙回延安。廖老为延安老诗人、女作家丁玲与丈夫陈明自金锁关登上陕北高原,一路浩荡而来,先在桥上拜谒了轩辕黄帝陵,继而到达延安。在延安几日,参观了革命旧址,去延安大学为学生做了场报告,然后直达当年的红都保安。丁玲虽然头上已是银丝累累,但激情还似当年,穿了一件颜色有些华丽的外衣,戴了一架红色太阳镜。在延安的当代文人中,丁玲最为有名,据说当年延安篝火之夜,那些青年跳的一种舞蹈,就叫“丁玲舞”,而丁玲的那些“文将军、武秀才”的或虚或实传说,亦有很多。除红军长征过来的人以外,丁玲大约是来陕北苏区的第一位文人,早在红军还没有住进延安城,而在被誉为红都的保安时,丁玲就来了。正是在保安,她在毛泽东的提议下,组织发起成立了当时第一个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团体“中国文艺抗战协会”(简称文抗)。

在延安大学作报告时,丁玲说一句,黑老用他的大嗓门当

扩音器,重复一句。延安几日的,丁玲除参观革命旧址外,还专门到清凉山她当年主持《解放日报》副刊的地方去寻找旧居。在登清凉山时,黑振东即兴吟成《致丁玲同志一首》,诗云:“适逢清明二月天,文坛女神回延安。历尽世间风霜苦,当念陕北米酒甜。宝塔山下‘丁玲舞’,桑干河上歌永言。八十重返旧游地,人生何须记流年。”当年黑振东的吟诗让丁玲百感交集。丁玲回来不到一年,即去世了。我曾致唁电,表示哀悼。

那之后为筹建延安文艺之家的事,延泽民和张锟曾先后来延安。延老大约来过三次,为延安艺术之家去四处鼓噪。张锟是第一次来延安,在延安察看了基地情况,约见了延安的一些作者,并和文艺界座谈。

大约是1986年到1988年期间,我们还接待了女作家李建彤,李建彤是著名陕北红军早期领导人、红军领袖人物刘志丹将军的弟媳,故可以说是陕北的媳。因此我的采访无拘无束,作家很健谈,说起话来滔滔不绝,有一种唇枪舌剑的感觉。李建彤受过许多磨难,而精神、气质甚至手中的笔仍旧如此犀利,令人赞叹。

欧阳山大约在1977年回过一次延安。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一提。欧阳山在延安时期的著名作品、解放区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《高干大》80年代曾由一位日本业余女翻译家多田正子译成日文出版。这位女士为翻译此书,与欧阳山曾有30多次信件来往,与延安方面信件来往更是频繁。其中原因,主要是书中一些陕北土语,使她犯难。1981年,她还亲自来了延安。高干大的原型——原南区供销社主任刘建章已故,多田正子主要与原副书记王旭明联系,王旭明的儿子则充当陪同。也许是爱屋及乌,这位女士与王的儿子来往中产生了感情,最后书成以后,提出要嫁给他,或者王去日本,或者她来中国。王是一个纯粹的陕北人,应邀去了一趟日本后,回来再不提这事。

再说德高望重的周扬,周扬于1987年、1988年“5·23”期间曾几次捎话,要回延安。这事引起了延安方面的极大重视,为筹建周扬感人场面,银笙同志在《延安报》有专访刊出。中将鲁艺旧址——位于桥儿沟的那个天主教堂收了回来,并做了修缮,迎接他的到来。周扬老因为疾病的原因未能成行,令人遗憾。

1983年5月和1988年10月,音乐家吕骥曾二度回延安,他也是老延安了,曾担任过鲁艺音乐系主任。吕骥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小老头,上万花山时疾步如飞,连年轻人都赶不上他,时已80多岁的高龄了,令人惊异。

1991年8月期间,毛泽东的儿媳、作家邵华来延。邵华高高的个头,气质很好,在座谈会上,延安人民对毛泽东的感情令她十分感动。她还详细地询问了毛岸英在枣园按照父亲所说的“补上生活这一课”的种种情形。

1991年11月,文学评论家冯牧在西安开会后,由《陕西日报》总编辑韩治国陪同重回延安。冯牧是一个在延安整整生活了8年的老延安,在此之前,我们竟然茫然不知。冯牧于1938年到延安,先在抗大继而在鲁艺文学院学习。毕业后曾在《解放日报》担任编辑,后调往部队,随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担任随军记者,后来的许多著名作家,当时似乎都是走的随军记者的路,例如郭小川、闻捷、杜鹏程等。1945年,冯牧随大军南下,离开延安。

冯牧在延安逗留三天,期间由我的作家朋友银笙陪同参观了枣园、杨家岭革命旧址、《解放日报》旧址、桥儿沟鲁艺旧址、南泥湾三五九旅昔日营地,凭吊旧人旧事,寻找当年的足迹。期间许多感人场面,银笙同志在《延安报》有专访刊出。

在延安期间,冯牧还视察了延安文艺之家。当年延安文艺之家筹建时,曾得到冯牧的极力支持。在延安文艺之家,由我做主持,冯牧与延安文艺界评论界见面,并即席做了报告。在报告中,他系统且满怀感情地回忆了自己成为一个革命文艺家的成长道路,并对延安的作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。

辉煌灿烂的延安时期,风云际会、群星灿烂、大家辈出,延安的杨家岭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沟,因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,成了一个标志,一个凝结感情的丰碑,一个时代的象征物。

谢觉哉夫人1981年2月回延安,曾溯零曰:“日照延安景常在,一代风流何时还?”

那张杨家岭合照正是草明从家中翻出,献给延安用以纪念的。葛洛向我谈了《白毛女》第一次彩排的情况,他当时去桥儿沟当乡长。《白毛女》彩排出来后,鲁院要葛乡长给桥儿沟桥边搭个戏台,他们演出。演出结束后,老乡们评价说,许多台词文绉绉的,完全是知识分子语言,老百姓听不懂不解像。这样剧组压着改了一回再演,再改台词。反复三次,才基本定稿。

翻开我的杨家岭采访本,拉杂杂地记下这些,还有曲作家陶柯,作家鲍昌,作家、学者古木,学者周艾若等,文中提到的那些老人大部分已经过世,而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正在日渐遥远。而我也有一把年纪了。因此,我想将这些记录下来,也是我的一种责任。

写完以上文字时,我的脑子里固执地回旋着“五月的鲜花开遍野,鲜花掩盖了志士的鲜血。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,他们曾顽强地战斗不歇”。这首抗战老歌,让我双目潮湿。

